

中國說唱文學

之

发展流变



盛志梅
著
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
013068234

1207.7

19

中國說唱文學
之發展流變



北航

C1676183
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
1207.7
1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说唱文学之发展流变 / 盛志梅著. —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
2013. 7

ISBN 978 - 7 - 5161 - 2826 - 8

I. ①中… II. ①盛… III. ①说唱文学—文学研究—中国 IV. ①I20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26118 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
责任编辑 王茵

责任校对 姜颖

责任印制 王炳图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(邮编 100720)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中文域名：中国社科网 010 - 64070619
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
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 11.25

插 页 2

字 数 283 千字

定 价 36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，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电话：010 - 6400979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的跋涉 新的开拓

——盛志梅《中国说唱文学之发展流变》序

早在 2008 年，盛志梅就出版了她研究中国俗文学的第一部专著《清代弹词研究》。在该书的出版后记中，作者动情地倾诉了在长达八年的写作过程中，自己遇到的种种艰辛，并喻之为是一场“跋涉”，曾令我十分感动。但这位天性倔犟的年轻学者，并没有被困难所吓退，也没有为前辈学者的赞誉而陶醉，她随即宣告：“我又该开始新的跋涉了！”想不到仅仅时隔五年，她研究俗文学的第二部论著《中国说唱文学之发展流变》又要问世了。这自然是她新的跋涉，新的开拓，我由衷地为她感到欣喜和钦佩。承志梅不弃，特意寄来了书稿，让我先读为快，并嘱我为她的新著作序。只是自己对说唱文学素无研究，岂敢言序。但考虑到我和作者谊兼师友，五年前已欠过她一次文债，此次若再推托，似乎有点过意不去了。出于无奈，我只能把我初读论著后的几句外行人的感想略书于后，作为对志梅的祝贺，也是向各位专家和读者朋友的求教。

以类型为基石，构建中国说唱文学历史。本书舍弃了文学史的传统写作模式，而改以类型为中心，分为上中下三编，各设专章，把各个历史时期重要的说唱文学类型详加考察。或探寻它们的源流，或剖析各自的体制，或评论它们的文本和演出，或梳理

它们的传播与流变，力求纵横贯通，点面结合，从而有机地把各种说唱类型组合起来，以凸显说唱文学的整体性发展。由于全书是由类型的联缀，而构成说唱文学的历史，整体结构看似散漫无序，其实细加体认，论著有其特有的内在关联和脉络，实有形散神聚之妙。

本书选择这样的历史构架，我想并非出于个人的凭空想象，而是基于作者对于说唱文学特性的深刻认识。因为说唱文学作为俗文学的一种，和传统的作家雅文学明显有别：第一，它不以作家为中心，而以艺人为主导；第二，它不以文本的阅读为流传方式，而主要以口头的说唱为传播手段；第三，它不以作家的艺术独创为主要追求，而是以受众的喜闻乐见为最大目标。如果说高雅文学具有一定的个人性与独特性，那么说唱文学就带有明显的群体性和类型性。在说唱文学领域中，艺人一生专攻和擅长的总是特定的说唱类型；作家编写中遵循以求适应的同样也是特定的说唱类型；广大受众乐于选择的娱乐方式还是特定的说唱类型。类型显然已成为说唱文学运行的核心因素，所以说唱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类型文学。本书选择从类型着眼，并以此作为构建中国说唱文学历史的基础，正是从研究对象实际出发的一种明智选择。这对说唱文学乃至整个俗文学史的撰写而言，无疑是一种独具识见的大胆尝试，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。

以体制为门径，开启说唱文学堂奥。长期以来，我们总是习惯于把内容决定形式作为文学研究的一条不变定律。其实在说唱文学领域中，更多的恰恰是形式选择内容，内容适应形式。而体制作为基本形式因素，在说唱文学的整个运行过程中自然便成了决定性环节。无论是说唱文本的编写，还是说唱曲目的演出，都要遵循特定类型的叙事体制和说唱体制的要求。作者从说唱文学这种独特性出发，便把体制的考察，作为研究说唱文学的不二法

门。类型特征的揭示，类型异同的辨析，类型谱系的建构，都总是从剖析说唱文学的说唱叙事体制入手。在作者看来，说唱叙事体制乃是说唱文学的一种标志性形态，自应成为说唱文学殿堂的最佳门径。

对于说唱文学体制的关注，以往的研究尽管总体较为薄弱，但就个别热门类型体制的研究来说，还是积累了不少成果。作者不仅充分吸取了前人相关研究成果，而且融入了更多的个人独到体认。从而使论著既有兼综之功，又富创辟之论，把说唱文学体制的研究提到新的高度。作者指出，说唱文学作为一种韵散相间、说唱结合的文学样式，我们的考察理应兼顾叙事体制和音乐体制，而绝不可偏于一端。但说唱文学虽然又说又唱，毕竟重在唱，它可以无说，却不能无唱。所以音乐因素在说唱文学研究中更有其特别重要的地位，必须给予更多的关注，这对以往研究中重文学叙事而忽视音乐成分的偏颇，具有一定的拨正作用。在说唱文学体制源流的考察中，历来有“外来说”和“本土说”之争，可谓壁垒分明，水火不容。本书作者则在认可本土说的前提下，力倡外来影响与本土传统有机结合，认为中国说唱文学既吸收了外来文化，特别是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，又体现了中国悠久说唱文学传统的民族文化底蕴，任何非此即彼的片面论断，都不可能客观揭示说唱文学的历史真面目。这对说唱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外来与本土之争，更是一种超越与突破。

以谱系为枢纽，联接说唱文学轨迹。说唱文学作为俗文学，其发展应有自身的独特逻辑，未必遵循“诗文代胜”的进化论文学史观。从流变而言，既有分流，又有合流，甚至还有断流；就谱系来说，既可纵向嫡传，又可横向联姻；从其发展脉络来看，则时而显性，时而隐性；考其名称，既可以名同实异，亦可以名异实同。总之，一切都显得扑朔迷离，远不像传统雅文学那

样清晰有序。因而说唱文学研究要从类型走向全局、由个案化发展成总体性，构建谱系、梳清脉络，自然就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前提性工作，因而本书为此也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考论。

在历来的研究中，人们总是把来源于印度的变文视为说唱文学的祖祢，而后世的诸宫调、陶真、词话、弹词、鼓词、宝卷等统统都是它一脉相传的嫡系苗裔。从而为中国说唱文学似乎找到了一个排列谱系的原点。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。即以诸宫调来说，历来都认为其上承唐代变文，其谱系几成定论。但本书作者经过深入细致的考察，继承并发展了前辈学人的主张，确证诸宫调的源头应从本土传统中寻找，其远祖是古乐府，近亲便是宋代大曲和词调，虽然不排除变文的影响，但其绝非变文的嫡传。作为一种有影响的说唱门类，诸宫调尽管早在元末明初，人们已鲜知其体制，可是它的艺术灵魂却并没有因此灭亡。它不仅继续存在于元杂剧之中，后世的弹词、鼓词等说唱文学也与它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。我以为本书这样的论断，比之于以往的传统说法可能更加靠谱。

又比如，何谓陶真，它和元明盛行的词话究竟有何关联？由于缺乏足够的实证材料，学界历来对此语焉不详。但论著却凭借1967年新出土的文物“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”，终于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底。作者认为陶真乃是一种流行于宋代的说唱文学形式，它上承唐代道士之俗讲遗风，下启元明词话之体制，在说唱文学体系中具有某种桥梁作用。而词话就是陶真在元代的别称，陶真和词话在体制特征上并无大的差异，在元代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两者实为并称。所以由唐代的俗讲，经过宋代陶真，再到元明时期的词话，其流变的脉络应是清晰可见的。到了明代嘉靖以后，又出现了两种新的说唱类型，便是弹词和鼓词。从它们的体制来看，前者显然承续了词话的血统，在江南流行；

后者则继承了词话的衣钵，而在北方盛传，各自形成颇有地域特色的说唱文学门类。但细究它们的叙事体制和说唱体制，却和陶真、词话实为一体之物。作者因此就从“词话”入手，对包括陶真、词话、弹词、鼓词等各种说唱种类之间的渊源流变关系进行了细致而清晰的梳理，并进而把中国说唱文学整个发展链条连接了起来。这正是该论著的归结之处，也是其对说唱文学研究所作的最突出贡献。

新著即将出版，预计作者在其后记中又该宣告新的“跋涉”计划了。那么新的开拓目标将是什么呢？如果顺着她的治学轨迹预测，会是中国俗文学史的编撰吗？我们期待着。

齐森华

2013年5月24日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导言 | (1) |
| 上编 敦煌遗书中的唐代说唱文学 | |
| 第一章 唐代说唱文学的研究范畴与分类原则 | (25) |
| 第二章 俗讲与讲经文 | (30) |
| 第一节 俗讲的基础——六朝的唱导活动 | (30) |
| 第二节 唐代的俗讲活动 | (35) |
| 第三节 唐代讲经文的内容和体制 | (42) |
| 第三章 变文 | (46) |
| 第一节 变文的含义与数量 | (46) |
| 第二节 变文的体制特征 | (52) |
| 第四章 敦煌遗书中的唐代其他说唱文学 | (57) |
| 第一节 说因缘 | (57) |
| 第二节 词文 | (64) |

中编 宋金元明说唱文学——诸宫调、陶真、词话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五章 诸宫调发展历史之概述 | | (79) |
| 第一节 宋代诸宫调的发展状况 | | (82) |
| 第二节 南戏《张协状元》“副末开场”的介绍 | | (86) |
| 第三节 金代诸宫调的发展状况 | | (91) |
| 第四节 元代诸宫调的发展状况 | | (94) |
| | | |
| 第六章 诸宫调存目作品概说 | | (105) |
| 第一节 《刘知远诸宫调》 | | (106) |
| 第二节 《西厢记诸宫调》 | | (116) |
| 第三节 《天宝遗事诸宫调》 | | (131) |
| 第四节 其他存目诸宫调作品源流考辨 | | (139) |
| | | |
| 第七章 诸宫调叙事体制的源流衍变 | | (148) |
| 第一节 诸宫调说唱叙事体制形成的源流衍变 | | (149) |
| 第二节 诸宫调韵散结合体制的发展历程 | | (156) |
| | | |
| 第八章 诸宫调音乐体制的源流变迁 | | (165) |
| 第一节 宫调与曲调 | | (165) |
| 第二节 构曲形式 | | (170) |
| 第三节 “赚”对诸宫调的影响 | | (176) |
| | | |
| 第九章 陶真 | | (190) |
| 第一节 崖词、陶真与宋代的说唱伎艺 | | (190) |

| | |
|--|-------|
| 第二节 宋元明文献记载中的“陶真” | (193) |
| 第十章 元明词话 | (201) |
| 第一节 《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》叙事体制 乃“陶真体”之考辨 | (201) |
| 第二节 《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》乃宋代 陶真之考辨 | (205) |
| 第三节 文献记载中的“陶真”、“词话”之别称 ——盲词、弹词、门词 | (211) |
| 下编 清代说唱文学——弹词、鼓词(大鼓)、 子弟书、宝卷、俚曲及《红楼梦》 的说唱改编 | |
| 第十一章 弹词 | (221) |
| 第一节 书场弹词及其基本特征 | (223) |
| 第二节 文人弹词及其基本特征 | (238) |
| 第三节 弹词的文体分化过程 | (248) |
| 第十二章 鼓词与大鼓书 | (263) |
| 第一节 鼓词溯源 | (263) |
| 第二节 鼓词的历史发展概况及其叙事体制 | (267) |
| 第三节 大鼓书概况 | (273) |
| 第十三章 子弟书 | (277) |
| 第一节 子弟书概述 | (277) |
| 第二节 子弟书的主要作家及其作品 | (287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三节 子弟书的传播 | (297) |
| 第十四章 宝卷 | (305) |
| 第一节 宝卷概述 | (305) |
| 第二节 宝卷的叙事体制 | (309) |
| 第三节 宝卷的文学性 | (315) |
| 第十五章 以《聊斋俚曲》为代表的清代文人俗曲说唱 | (320) |
| 第一节 《聊斋俚曲》的内容 | (320) |
| 第二节 《聊斋俚曲》的艺术特色 | (325) |
| 第十六章 《红楼梦》的说唱改编 | (331) |
| 第一节 《红楼梦》的俗文学“基因” | (331) |
| 第二节 《红楼梦》的说唱改编 | (336) |
| 主要参考文献 | (340) |
| 后记 | (346) |

导 言

一 说唱文学“外来说”研究思路之溯源

本书是以中国说唱文学为研究对象的。研究之初，即碰到了一个原则性的难题，即立足点的问题。这个问题放在导言部分来解决，以彰显其重要性。说唱文学的源头在哪里？总结起来不外乎两种，一是外来说，一是本土说。“外来说”是由敦煌变文入手探讨说唱文学的源流衍变的。他们的讨论往往与什么是“变文”、变文的起源在哪里联系在一起，有的时候甚至变成了一个问题，是学者们在探讨变文、俗讲的起源问题时延伸至说唱文学的。持“外来说”者认为说唱文学始自变文，其根子在印度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而“移植”过来的一种文体——这个思路是学界自敦煌文献发现以来的“主流思路”，最先提出者，应该是胡适。

早在 1927 年，胡适的《白话文学史》讲义就由北京文化学社刊出了。1928 年，修改后的《白话文学史》出版了。在“自序”里，胡适就说：“新出的证据（引者按：此处指包括敦煌俗文学史料在内的新材料），不但使我格外明白唐代及唐以后的文学变迁大势，并且逼我重新研究唐以前的文学逐渐演

变的线索。”^① 该书的第十章（作者在序言中未提及对此章节修改），进一步这样说：

印度的文学有一种特别体裁：散文记叙之后，往往用韵文（韵文是有节奏之文，不必一定有韵脚）重说一遍。这韵文的部分叫做“偈”。印度文学自古以来多靠口说相传，这种体裁可以帮助记忆力。但这种体裁输入中国以后，在中国文学上却发生了不小的意外影响。弹词里的说白与唱文夹杂并用，便是从这种印度文学形式得来的。^②

.....

大概诵经之法，要念出音调节奏来，是中国古代所没有的。这法子自西域传进来；后来传遍中国，不但和尚念经有调子；小孩念书，秀才读八股文章，都哼出调子来，都是印度的影响。^③

虽然对于新发现的敦煌资料兴奋不已，而且一口气提出了如上所引的诸种说唱文学源自印度佛教的说法。但胡适在“大胆假设”的同时，还在“小心的求证”着，且在求证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些与他的“假设”相龃龉的事实：

近年有几位学者颇主张这一类翻译的文学（引者按：指《佛本行经》等书）是《孔雀东南飞》一类的长诗的范本。我从前也颇倾向这种主张。近年我的见解稍改变了。我

^① 胡适：《白话文学史》“自序”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6页。后面所引胡适《白话文学史》版本同此，恕不一一标注。

^② 胡适：《白话文学史》，第111页。

^③ 同上书，第127页。

以为从汉到南北朝，这五六百年中，中国民间自有无数民歌发生。其中有短的抒情诗和讽刺诗，但也有很长的故事诗。在文学技术的方面，从《日出东南隅》一类的诗演变到《孔雀东南飞》，不能说是不连续的，也不能说是太骤然的（参看第六章）。正不用倚靠外来的文学的影响。

与其说《佛本行经》等书产生了《孔雀东南飞》一类的长诗，不如说因为民间先已有了《孔雀东南飞》一类的长篇故事诗，所以才有翻译这种长篇外国诗的可能。^①

同时，对于翻译文学与原文的差异以及翻译的难度，他也注意到了，如他引《僧传说》：

什既牵多谙诵，无不究尽。转能汉言，音译流便。……初沙门慧睿才识高明，常随什传写。什每为睿论西方辞体，商略同异，云：天竺国俗甚重文制；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。凡觐国王，必有赞德。见佛之仪，以歌叹为贵。经中偈颂，皆其式也。但改梵为秦，失其藻蔚，虽得大意，殊隔文体。有似嚼饭与人，非徒失味，乃令呕哕也。^②

既然佛经在翻译过程中“改梵为秦，失其藻蔚，虽得大意，殊隔文体”，“用的散文大概（按：着重号为引者加）是根据于当时人说的话……用的偈体大概（按：着重号为引者

^① 胡适：《白话文学史》，第120页。

^② 同上书，第107页。

加)也是依据当时民歌的韵文”,^①这与“弹词里的说白与唱文夹杂并用,便是从这种印度文学形式得来的”的说法是不是就有点自相矛盾了呢。胡适很诚实地把自己的想法写了出来,态度是认真的,严谨的。他的困惑同他的惊喜一起并存于这“中国第一部通俗文学史”之中。可惜的是,后来者对于他的这种谨慎没有太在意,反而对于他的那些“假设”“大胆”地继承过来,并发展成为现在学界比较占主流地位的学术观点:韵散结合体制的文学乃是佛教宣讲后的产物,其源头在印度,而且由此确立了一门新的学科:讲唱文学。肇始之功在郑振铎。

郑振铎在《中国俗文学史》第一章“何谓俗文学”第三部分,将中国俗文学分为五大类:诗歌、小说、戏曲、讲唱、游戏文章,其中讲到第四类“讲唱文学”时;作者写道:“这个名词是杜撰的,但实没有其他更适当的名称,可以表现这一类文学的特质。”因为这类文学虽然有表演因素,但因为它“全部是第三身的讲述,并不表演的”,所以与戏曲还是有别的;它们也不是叙事诗,虽然有韵文出现且占叙事的重要部分。那么,“这一类文学的特质”是什么呢?换言之,“什么样的文学才是讲唱文学呢?”郑振铎说“他们是另成一体的”:

这种讲唱文学的组织是以说白(散文)来讲述故事,而同时又以唱词(韵文)来歌唱之的;讲与唱互相间杂。使听众于享受着音乐和歌唱之外,又格外的能够明了其故事的经过。这种体裁,原来是从印度输入的。最初流行于庙宇里,为僧侣们说法、传道的工具。后来乃渐渐的出了庙宇而

^① 胡适:《白话文学史》,第121页。

入于“瓦子”（游艺场）里。^①

也就是说，这种文学是叙事的，其表现形式是韵散相间，其传播过程的最后环节是与受众共同完成的。这是郑振铎先生基于“变文”的发现而对“讲唱文学”这个新名词“量身定做”的一个概念，他接着将变文以后（包括变文在内）的“讲唱文学”分为“变文、诸宫调、宝卷、鼓词、弹词”五大“板块”，认为它们都是变文的苗裔——“‘变文’；这是讲唱文学的祖祢，最早出现于世的。”^②自此之后，学者们在对“说唱文学”有所研究或者探讨时，往往都要先说一点与变文的关系。

对说唱文学源流梳理有重大贡献的叶德均也不能免俗。郑氏的研究，是在全盘接受郑振铎的这个定义的基础上进行补充的。他在《宋元明讲唱文学》中开篇即说：“讲唱文学是用韵散两种文体交织而成的民族形式的叙事诗，叙述时是有说有唱的。”^③讲唱文学是韵散相间的，这一点是继承郑振铎而来的。但他说讲唱文学是“民族形式的叙事诗”，则是一个很大胆且有卓识的看法。因为郑振铎明确说过“他们也不是叙事诗或史诗；虽然带着极浓厚的叙事诗的性质，但其以散文讲述的部分也占着很重要的地位，决不能成为纯粹的叙事诗。”^④

可惜的是叶氏仅仅往前迈了一小步，接着又退回去了。因为他在上引论述之后，接着又说：“唐五代僧侣们所创制的俗讲是讲

^① 郑振铎：《中国俗文学史》，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，第 7 页。后面所引郑振铎《中国俗文学史》，版本同此，恕不一一标注。

^② 郑振铎：《中国俗文学史》，第 8 页。

^③ 叶德均：《戏曲小说丛考·宋元明讲唱文学》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，第 625 页。后面所引叶德均《戏曲小说丛考》，版本同此，恕不一一标注。

^④ 郑振铎：《中国俗文学史》，第 7 页。